

他者想像與自我認同：鴉片戰爭前夕 傳教士筆下的南中國海地區報導

——以《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為中心*

龍其林

【提要】 《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是第一份在中國本土出版的近代中文報紙，它由西方傳教士負責編輯、出版，其中用相當篇幅介紹了南中國海地區的中外商業貿易狀況、早期的移民者和商賈，充分表現了19世紀30年代傳教士眼中的南中國海地區情景，反映了西方傳教士對於中國文化、中國形象的感知，是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其中的文化偏見與誤讀折射了西方傳教士對於進入古老中國文化的渴望與焦慮。

【關鍵詞】 傳教士 南中國海 文化報導 《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

【中圖分類號】 K249.5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3 - 0092 - 10

《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1833年8月1日創刊於廣州。這份報紙在中國報刊史、新聞史和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不僅是我國本土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報刊，而且所反映的傳教士筆下的鴉片戰爭前夕的南中國海地區中西交流報導，為我們理解這一時期西學東漸的程度與中國本土文化對於西方文化的接受途徑、態度也有了更直接的認識。鴉片戰爭前，外國人在廣州的活動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在這種情形下，《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在廣州的創辦更具有重要的文化傳播意義，它面向中國人尤其是廣州民眾宣傳西方宗教思想、科技觀念和新聞報導，形成了對於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社會、文化的生動描述。黃時鑒、羅大正、姚遠、郭秀文、趙少峰等學者已對《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作了較為詳細的研究，他們從這份刊物的創辦社會歷史背景、宗旨及編輯特色、宣傳策略、在中國新聞傳播史的地位乃至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以及刊物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呈現出的過渡形態等角度出發進行

* 本文係澳門大學大型研究項目“南中國海歷史文化研究”（項目號MYRG196[Y2-L4]-FSH11-YY）的階段性成果。

探究。在此基礎上，本文將這份刊物置於南中國海歷史文化的大格局下審視，考察編撰者對這一地區的經濟貿易、文化交流等所作的報導及其傳達的文化信息，分析鴉片戰爭前夕傳教士在刊物報導中所呈現出的對於南中國海地區的認識和想像。需要說明的是，本文討論的南中國海是一個廣義的地理概念，即南部邊界位於南蘇門答臘和加里曼丹之間，北邊及東北至廣東、廣西、福建和台灣及台灣海峽，東邊至菲律賓群島，西南至越南與馬來半島。從明朝後期開始，南中國海地區即成為西學東漸的主要通道，西方思想、文化和科技經由南海及其周邊地區向中國內陸傳播，在中國近代化發展過程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義。

一、關於貿易問題的主張

《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力圖向中國讀者介紹近代西方的科學技術和西方文化，希望通過這些科學、技術、思想的輸入，改變中國人固有的蠻夷觀念和自我中心主義意識。正是出於對中國人自視為世界中心觀念的解構，該刊將重點放在對於西方科學文化的介紹上。刊物既有對於西方歷史文化的宏觀介紹，如《東西史記和合》、《地理》等欄目，又有對於西方科技、事件的介紹，如《天文》、《新聞》等欄目。在這些內容當中，能夠直接反映出鴉片戰爭前夕南中國海地區中西文化碰撞、交流景觀的則是有關中西商業貿易的介紹。對於中西商業貿易情形的描述，多半出現在《論》、《貿易》等欄目之中，這些文章的內容有時從中外貿易中的堅守誠信、遵從商業道德等角度入手，勸戒中國人應誠懇對待外國遠客：

奈何德行之道，人皆知之。但守之者鮮矣。故此必詮解勸四方君子，盡力以仁義為重，以利益為輕，實是生意公平之狀。欲以哄騙謊言利其業，嗚呼，遠哉其錯乎？譬如開鹽糖油之鋪，雜其貨以卑物，特意增價。固積米穀者，待頂價未敢發賣。於此時際，貧民飢死，恁船隻作行甚可恨。莫說取人之憎，還上帝令禍災壞該人也。匪徒用鬼巧在秤桿索上，莫非是可惡的動舉乎。^①

該刊力圖拓展中國民眾知識、展現中西貿易的益處，因此對於如何用中國民眾最喜聞樂見的方式宣傳對外貿易的重要性上下了許多功夫。在宣傳對外貿易的重要性時，最喜歡通過《通商》、《貿易》等欄目加以立論，詳細論述對外通商不僅對於中國百姓獲取生活物資有利，更能夠增加國家稅收，實現中國的民富國強。為此，編撰者不遺餘力地強調：

禁止通商，如水底撈月矣。故明君治國必竭力盡心，以務廣其通商也。誠以國無通商，民人窮乏，交易隆盛，邦家興旺。且國禁其買賣，民成蠻狄矣。使有願治之君，教化庶民，而不開其通商之道，以廣其財源之路，欲其國之攸寧者，是猶緣木以求魚者也。^②

如果說上述文章還只是編撰者對於海外貿易重要性的強調，希望能夠從理性的角度啟發中國人的商業意識、對外友好態度的話，那麼該刊的其他報導則根據中國文化習慣，編輯了一些頗富小說意味的文章闡述中西貿易的價值。這類文章通常以兩人對話為主，編撰者為其設置兩個中國人，他們居住於廣州府，對於西洋事物頗感興趣，因此經常在對話中涉及到西方文化、科技、商業，其中商業內容較為常見。刊物中討論的兩人，一為思想開放、親近西方文化者，一為觀念保守，對西方科技、文化持猶疑態度者。隨著此兩人對話的進行，最後多以思想開放者說服觀念保守者為結局，從而印證著西方文化較之中國文化的優越性和先進性。例如，在道光戊戌年（1838）三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編撰者以辛、曾二人的辯論為線索，以主張對外貿易利國者的勝利，反映出在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社會對於對外貿易優劣的長期爭執：

話說自五月至於十月，各國之甲板，陸續進廣州口。事物殷繁，俗務紛紜，洋船交易，流通出入，生理十分興盛。艇來艇去，出載，裝載不絕矣。且說在珠江邊，有兩個同僚一姓辛，名鐵能，一姓曾，名植產。兩人雖攻書，勤讀史書，然識世務，一分明白。每年親眼看見各國通商，易正項貨物，就莫不四處巡查問訪，與外國貿易裨益否。但兩朋友意見向不相侔，辛只說，此樣貿易損國，害民。而曾話，易正項貨物，為民生之大利，於國家關係甚重。^③

這對朋友經過長時間的爭論尚未達成共識，一次他們又偶然相遇在河邊，彼此又談論起對外貿易的利弊，從而將這場為時持久的爭論推進到了更深的層面。辛鐵能代表的是傳統士大夫對於海外貿易的態度，認為海外貿易將中國物產載出國門，將導致民眾無法滿足自己的各類需要：

“如今停泊互市之船隻雲集輻輳，誠恐載出我中國之嘉物，令庶民乏需矣。但床頭如洗，巧婦無米難炊。”而在他的朋友曾植產看來，對待海外貿易不能只看到其載出貨物的一面，更應該看到外商載入貨物、互通有無的意義：“各船隻入口，不空來，而載貨物，或各項洋布、呢羽，或棉花、鐵、藥材等貨，以此易買回國貨物，如此無損而有益矣。設使無益，我商伶俐，不肯賣也。如此貿易不損而裨益。所載出之物件，不是罕有之貨，價昂之物，遠客買這項，只折本，連草野之夫，不敢作此。”接下來，編者又借辛相公之口，傳達出一般百姓對於海外貿易過程中將國之金銀載出外海的擔憂：“所納餉幾百萬銀，亦不打緊，但所載出十百萬紋銀，甚為害也。十年以後，我庫項空，日鎖愁眉，只為床頭金盡。”曾植產則運用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基本價值規律予以反駁，認為海外貿易不僅不會導致國庫空虛，而且還會帶來豐富的收益：“我中國濱海港汊，各國花銀，居民用為通行國寶，誰載入之，莫非遠客乎？至於紋銀載出，載入，不可管束。設使銀起價，所載入者繁多；落價，所載出者不勝數，此乃自然之理，則不可查禁也。倘載出銀者，亦取其價值之貨，何謂之損哉？”^④

在這段文章中，編撰者就對外貿易對於民用、國庫的影響展開了辯論。其中曾相公以其對於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的模糊感知，以及認識到的海外貿易的有利影響，實質上表現的是鴉片戰爭前夕，西方傳教士希望向中國民眾傳達的對於海外貿易重要性的認識。刊物的編撰者很清醒地意識到海外貿易對於民眾生活物資和國家賦稅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因此不斷在各期報刊中反復強調這一主題，試圖從思想角度轉變國人的華夷觀念，將西方國家視為貿易上的夥伴。事實上，僅以中國茶葉的對英貿易而言，在鴉片戰爭前夕中國依然從這項海外貿易中獲得了豐富的收入。“茶葉大量輸入英國，英國輸華物資在鉛、錫、棉花之外，卻無相應的貨物輸出，為求貿易上的平衡，英國只得支付白銀，每年從本國和印度流入中國的白銀在100萬兩以上，最高年度（1820～1821）達到556萬兩以上。”^⑤

同時，對於海外貿易中的盈虧、盛衰，刊物的編撰者也能抱著理性、樂觀的態度。如對於廣州地區的海外貿易，刊物對其階段性的興衰有過多次描述：

世事不定，或興或廢，或盛或衰矣。近省城之貿易漸盛，英商船數只載貨出口，尚有四五隻貿易買回國貨物。而財帛未多，本錢缺乏，生意難作。花旗船三隻載銀，來買綉緞各項也。米粟平價，庶民滿用，而未缺湯餅之需矣。^⑥

茶葉湖絲等貨，載於外國起價，及省城之生意繁盛，洋舟俱載貨返棹，經商遠地跋涉，勞頓，或火速發重財，或率然損重財，這也常理不改。今年之貿易始虧乏，終於盛矣。^⑦

由於海外貿易條件經常變化，因此相關的商品價格也會發生相應的漲跌。“1834年東印度公司解散後，怡和公司立即起而接替，繼續經營茶葉貿易。1834年4月後，英國商船改從新加坡輸入大批華茶，不但質量和廣州一樣，而且節省時間，免得在廣州交納重稅，因此茶價反而有所降低。”不僅如此，由於西方國家民眾商品消費習慣的變化，也導致一些產品在中國形成截然不同的銷路。“英國東印度公司初期運輸茶葉，到1760年以後，由於綠茶在倫敦市場上摻假嚴重，信譽掃地，改運紅茶，多屬武夷茶、工夫茶、小種茶，貢熙茶。英國人因此嗜飲福建紅茶，紅茶在英國暢銷。1792年東印度公司運到英國的紅茶有15.6萬擔，值3413054銀兩，而綠茶僅1500擔，值624640銀兩，只佔極小部分。”^⑨這種現象，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也留下了烙印。在道光戊戌年六月的刊物中，編撰者記錄下了這樣一段細節，反映了中國國內的茶葉種植者因無法獲知海外消費習慣的變遷，而依然生產大量綠茶，導致茶葉價格低廉，無法獲利；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卻是屬於紅茶之一種的武夷茶十分暢銷：

年紀之貿易已完焉。若論綠茶葉之客，失本無利矣。武夷茶庶乎盡發賣了。湖絲之價無高無低，卻載出外國之者少也。^⑩

俄羅斯航海家伊·費·克魯森什特恩曾對19世紀早期所見的廣州茶葉市場的銷售情況有過一段描述，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所記載的不同茶葉銷路迥異的情形，反映了不同的消費群體及其消費習慣對於茶葉輸出國產業的影響：

美國人和英國人很少購買各種優質茶葉。前者主要購買綠茶“貢熙”，廣州商人稱之為“新貢熙”，那裡一擔賣36~40兩銀子，即60~70戈比一磅。英國人和美國人在廣州買得最多的茶葉品種是“功夫”茶和“武夷”茶，後一種是最差的，但在英國很多普通人喝它，茶葉對他們來說也是必需品。在英國常常把“功夫”茶和“武夷”茶混在一起，這樣賣得最多。“武夷”茶的價格在廣州低到不值一提，10~12兩銀子一擔，也就是18~20戈比一磅。^⑪

在道光甲午年（1834）正月的刊物上，曾經刊登了一則《省城洋商與各國遠商相交買賣各貨現時市價》^⑫，其中所列舉的“出口的貨”中，工夫茶、小種茶的價格要高於其他茶種，甚至安溪小種茶還處於缺貨狀態，供不應求。《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所撰寫的商品市價報導，反映了當時的商業貿易信息和價格行情，是我國中文報刊刊登物價廣告的肇始，蘊含著豐富的市場信息和歷史背景。

二、南中國海地區的早期移民者和商賈

隨著南中國海地區中西交往的不斷增多，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通過海外貿易獲取利益。在這一過程當中，有人從不願出洋到來南海從事貿易後思想觀念發生了巨大轉變，表明了安土重遷的農業文明觀念在南中國海地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有的人則直接出國居住，長期淹留國外，這既是早期南中國海地區移民者生活的反映，也產生了諸如戶籍等相關問題。

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曾經描寫了一位來自廈門的商人到新加坡一帶從事海外貿易，最後賺取了豐富的利潤，解決了家庭生活的窘困。這則報導說的是道光八年（1828）的時候，廈門有一富家子弟叫林興，本來是家中“堆金積玉，財帛盈箱，到處揚名”，但是後來事業浮沉，船隻載幾萬貨遭大風沉沒，導致損失慘重，負債累累，店鋪關閉。正在他因家事蕭條忍饑挨餓時，忽然收到江蘇上海寄來的書信一封，原來是他的一位朋友請林興赴新加坡，買胡椒、燕

窩、豆蔻、丁香等貨，並寄來銀三千兩。林興讀完書信，心裡頗費躊躇。他“自知經商遠地，只為蠅頭微利，汲海凌山，馬背風霜，舟車勞頓，耐不住矣”，最後由於經濟壓力“無奈何而乘洋舶到新嘉坡”。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當林興來到新加坡卻發現是另外一種情形。“當是之時，經營紛紜，鬧熱，商賈奔馳，如影及西方，人雲集矣。三月期，林興置買各貨，恨不能插翅飛歸家庭，就反棹而旋。到港發賣洋貨，除盤費船租銀外，獲利八百兩。”^⑩

南中國海地區的貿易固然使沿海的人們通過海外經商攫取了利潤，但更深遠的影響則在於通過這種對外交往方式，沿海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他們不再以農耕文化的保守觀念看待海外貿易，不再將其視為洪水猛獸，而是較為客觀地指出了中外貿易過程中的貨幣流通現象及感覺到的內在規律，這對於拓展當時中國民眾的海外視野、經濟知識具有重要的意義。在該刊中，編撰者傳達了林興回國之後的態度轉變和思想認識的落差，揭示了海外貿易對於糾正人們保守的思想觀念所具有的影響。當朋友聞知林興從海外貿易獲利回來後，都來慶賀。其中一人姓梁，是一個孤陋寡聞的迂腐書生，他對林興從事海外貿易頗為不屑，認為南洋人此舉不過是“或賣船與人，或載來接濟”，並不損害國家利益，倒是中國沿海地區人們的海外貿易對國家構成了威脅：“異域所運出金銀財帛，損內，利外，大關於國家者。設使晚生權在掌握之中，立示禁止其舶出洋，以省盜案。”^⑪林興對這種謬論進行了辯解和駁斥，他首先從南洋人們的友好入手，認為他們並不懷有惡念：“自堯舜之時，至於今日，南方土人恒懷友心，莫不厚待唐人，連一次也未結罅隙。況貿易彼此獲益，甚推雅誼殷情。莫說結仇，就睚眦之怨亦未有。”在此基礎上，林興從不同地域的人口數量、物產差異、價值等入手，指出與海外貿易對於中國的諸多益處：“又其南方之山林深密，材木比內地更堅固，且無昂價。商人每購買而用之，如鼎竈桅一條，在外國不過十幾兩，至內地則值千金。我中國人每年造許多船隻，便是洋商與外客不造賣船，而尚買其材木也。至於米粟，南方豐盛，每石二員有餘。中國人煙稠密，戶口繁滋，五穀自然價昂。然買貴、賣低，雖至愚者不為也。反載南方之穀，運入我國，大關於國家民生矣。又其沿海各省，不生銀礦，皆需外國花銀，每年所載入者，幾十萬，而船所運出者，數萬而已。由是觀之，與南洋貿易有利而無害。”林興更進一步意識到了海外貿易對於提高國家稅收、滿足物資需求以及提高人們生活水平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外通貨財，內消奸宄，百萬生靈，仰事俯畜之有資。各處鈔關，且可多徵稅課，以足民裕國，其利甚大。”值得注意的是，林興已經意識到國內由於人口眾多，就業不足，容易導致遊手好閒群體的出現，主張通過向海外輸送勞動力來解決本省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夫本省之民繁多不勝數，其遊手無賴，若不出外國經營，就誠恐滋事。但移南方，銖積寸累，稍有微積，或回國以濟親戚，或寄銀兩以著人子之孝心，豈不美哉？自是言之，民人與海外貿易，載其國之餘物，以補內地之用，甚廣黎民之營生。設使營生無計，何異鼠入牛角哉。”最後，人們在林興的高談闊論中意識到海外貿易的諸多好處，都“讚譽外海貿易經營，而不住口欣仰矣。”^⑫

在這段論述中，有幾個細節值得注意：第一，朋友們得知林興海外貿易獲利後都在慶賀，並且讚譽海外貿易，“欣仰”不已，這是人們商業意識的萌生，也暗示著生活在沿海的這群人們的思想觀念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轉變；第二，林興在海外貿易中通過買低、賣貴來賺取中間差價，認為商船運入和運出貨物的價值呈貿易順差狀態，表明了南中國海地區的人們對於經濟現象具有了一定深度的認識；第三，報導對海外貿易的優勢進行了確認，認為海外貿易不僅可以解決本國民眾的就業問題，而且可以載它國之物補內地之用，足民裕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些南中國海地區的中國商人，甚至上海、泉州、廈門地區的商人都紛紛參與對外貿易，他們中的一些人飄洋過海，在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生活、貿易。刊物中對於這類商人有過描述：

此小島，是大英國之憲所管。叫名新甲埔，雖然極小，其埔頭之生理，在南海至盛。莫說西洋甲板繼續往來，武吉兼馬菜酉船無數進出。就是安南、暹羅，各國船，至彼，蓋大英國之官，不納餉稅，准各人任意買賣貿易，無防範，無勒索，安然秩序發財。雖然其正餉不足為意，但因商賈輻輳，國家莫不沾潤國幣。上海縣、泉州府、廈門、湖州府、廣州府並瓊州府之船，都往新埔頭做生理。並幾千福建與廣東人住此為商匠士農，各悅興頭，英吉利有營汛建炮臺。^⑭

隨著南中國海地區中國人與海外交往的日益增多，謀求在海外定居者開始不斷增多。對於這種現象，《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專門撰有一文《遷外國之民》作了描述。在談到中國早期的海外移民時，刊物認為主要是南中國海地區的人們為生活所迫，不得不為之：

廣東潮州、廣州府、嘉應州、福建漳州、泉州府，而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日食難度。故市井之窮民遷安南、暹羅、南海各洲地方，覓圖生意。^⑮

由於南中國海地區外出謀生的人越來越多，持續的時間也越來越長，相應地產生了許多問題，其中對於是否允許這些人返回原籍便成為當時地方官員關注的問題。兩廣總督、廣東撫院上奏皇帝，希望能夠允許這些出洋之人返回原籍：

據稱出洋貿易之人，皆挾貲求利，素非為匪。且內地各有妻孥產業，原未有肯輕棄家鄉，只因海洋商賈通信靡常，賬目取討非易，又或疾病難歸，棲身番地，或在船充當舵水，遭風流落，凡此皆係欲歸不得，初非有意淹留。^⑯

由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政府曾禁販南洋，而雍正五年（1727）又複開洋禁，因此如何處理那些長期滯留海外的人們，顯得較為複雜。上奏官員強調在確定欲回籍者並無為匪經歷後，可以准其回國，家室子女也可一併帶回。對於那些本國民人的遺孀，也准其自願回中國：

責成船戶查明，實係內地良民，在番並無為匪，果因欠賬疾病諸事逗遛，及遭風避難淹滯者，出具切實保結，無論例前例後，一概准其附載回籍。所娶家室生有子女，准其隨帶。若本人已故，所遺家屬，情願附搭，親友熟識，便船回籍者，一體准其帶回，交與各親屬，安插寧居。其攜有貲財貨物，地方官不得藉端索擾。^⑰

對於不同的出洋滯留者，文章中認為應該區別對待，對那些品行不端者嚴行查禁，而對於良民則應查明緣由，出具保結，准予回籍。

洋販既不禁止，則辦理亦需權衡。其中如遊惰私渡，及水手人等逗留在番，哄誘外洋婦女娶有家室，迨無以為生，複圖就食內地者，自應嚴行查禁，不准回籍。並船戶在洋逾限，亦請照例將舵水人等，不許再行出洋外。其餘實係貿易良民，因欠債疾病遭風等事，致逾三年定限者，應仍令船戶查明緣由，出具保結，准其搭船回籍，如此則內地良民，均得陸續還鄉，不致終淪落異域等語。^⑱

南中國海地區人們逐步參與到各類貿易過程之中，有機會與不同民族、文化的人們互通有無，增長見識，並以自身經歷現身說法，打破了儒家農耕文化觀念的束縛。其間雖然也因為早期沿海居民的出洋滯留，引發了戶籍留存與否的爭議，但這並不能遏制人們對於與外國貿易、出洋覓求發展機會的渴望，誠如當時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在奏摺中所言，“現在開洋貿易之民源源不絕”^⑲。

三、他者想像抑或自我需要

應該看到，《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對於鴉片戰爭前夕南中國海地區文化景觀的勾勒，在某種意義上折射的是傳教士們自身文化的投影，刊物中所表現的也正是他們對於中國文化的期待。換言之，編撰者著力通過《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試圖展現的，並不是完全符合現實情形的南中國海地區的歷史和文化，而是經過了其文化過濾和精神篩選之後，精心建構起來的一個文化他者的形象，這個形象很顯然是經過了傳教士們的信仰、立場、思想、情感等多重需要淨化之後的圖景。因此，在傳教士們以自身文化為中心的座標體系中，南中國海地區的那些與其接近的文化景觀、社會現象、人物觀念，自然容易被刊物加以記錄、贊同；而一旦與刊物編撰者的立場、價值觀念相差較遠甚至背道而馳的文化景觀和人物、現象，則容易被忽略、遺忘或指責。

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創刊號的《序》中，編撰者闡述了其出版動機和理想，為我們理解這份刊物的創辦背景提供了契機：“人之才不同，國之知分別，合諸人之知識，致知在格物，此之謂也。”又說：“子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是聖人之言不可棄之言者也。結其中外之網繆，倘子視外國與中國人當兄弟也，請善讀者仰體焉，不輕忽遠人之文矣。”^②這是刊物為中國讀者撰寫的出版說明，顯示出其對中國文化的親近與友好態度，強調中外文化的互補性。“郭士立不似那些謹慎的傳教士，他向來認為應該盡可能去瞭解中國人，好讓他們皈依基督教：‘須從彼等之口，知其偏見，目睹其惡行，聽其辯解，方能知彼等……吾人應完全順應中國人之所好。’”^③由於《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面對的是華人讀者，因此該刊在表述辦刊方針、目標以及用語時都極為注意讀者的感受，編撰者在涉及到辦刊目的、價值態度時往往非常謹慎，避免將自己的內在動機和心理呈現在華人讀者面前。於是，刊物的編撰者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和同時期的外文報刊上表述辦刊動機和目標時，就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如果說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創刊號上，編撰者們對於刊物的宗旨主要強調為宣揚中外友好、文化共通的話，那麼郭士立在英文報紙《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撰寫的文章中，則在傳教士同行面前直接透露了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的深層目的：“當文明幾乎在地球各處取得迅速進步並超越無知與謬誤之時，——即使排斥異見的印度人也已開始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獨中國人卻一如既往，依然故我。雖然我們與他們長久交往，他們仍自稱為天下諸民之至尊，並視所有其他民族為‘蠻夷’。如此妄自尊大嚴重影響到廣州的外國居民的利益，以及他們與中國人的交往”，《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其出版是為了使中國人獲知我們的技藝、科學與準則”，“編者偏向於用展示事實的手法，使中國人相信，他們仍有許多東西要學。又，悉知外國人與地方當局關係的意義，編撰者已致力於贏得他們的友誼，並且希望最終取得成功。”^④不難看出，《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的編撰者出於對中國人盲目自信、妄自尊大心理的反撥，以及對“華夷”觀的痛恨，因而表現出糾正華人印象、展示西方文明優越性的強烈願望。而從本質上而言，刊物編撰者的目的還是在於維護在廣州及其它地區的外國居民的利益，以便他們能夠與中國人較為順利地交往。事實上，郭士立從1831年起就在中國沿海許多地區遊歷，對中國社會和文化較為熟悉，他通過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展現西方人的文化價值和特點，使華人可以藉此渠道瞭解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藝術，促進中國人對於西方的瞭解、接受和認同，進而為西方傳教士及西方商業、文化的輸入創造條件。

同樣地，《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在對待西方國家向中國輸入鴉片的問題上也表現出了這種身份上的微妙差異。1835年2月，郭士立被英國商務監督律勞卑聘為翻譯，他曾先後十次遊歷

中國沿海，搜集了大量的政治、經濟、軍事資料，這對其日後參與鴉片戰爭和起草《南京條約》積累了條件。而在鴉片戰爭時，郭士立更成為英國海軍司令的嚮導，協助其指揮作戰。在參與簽訂《南京條約》的過程中，郭士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並在後來擔任港英政府的中文秘書。鴉片戰爭前，雖然新教傳教士們在對華戰爭問題上多持贊同態度，但在如何處理鴉片問題上則多持反對立場。他們基於普遍的人道主義精神，反對西方國家向中國大量運輸鴉片。在《中國叢報》上，西方傳教士們撰寫了許多文章，紛紛對鴉片貿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和批評。^④在這種情形下，作為《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主要編撰者的郭士立的態度和行為就顯得尤為引人矚目。“1840年前，傳教士中與鴉片貿易有直接關係的，只有鼓吹迫使中國‘開放’的郭士立。郭士立參與鴉片貿易的主要活動，就是跟隨鴉片販子在中國沿海售賣鴉片，充當鴉片販子的助手和翻譯。他充當這種角色一方面可以說是由於情勢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心甘情願。大鴉片販子查頓在邀請郭士立為‘氣精號’飛剪船帶路並做翻譯時坦率地說：‘我們主要依靠的東西是鴉片……很多人認為這是不道德的交易，但這種交易是絕對必要的，它可以給任何船隻提供合情合理的、可以賺取其所支出的費用的機會，我們相信您在每一個需要您提供服務的場合，都不會拒絕充當翻譯。……這次冒險越是利潤豐厚，我們撥給您支配的、可供您今後用於推進傳教事業的（金錢）數目就越大。’查頓還答應負責郭士立將要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月刊）6個月的費用。渴望經濟來源以支持其野心勃勃的傳教活動的郭士立，無疑為查頓開出的條件所吸引。”^⑤

值得說明的是，郭士立在對待鴉片問題上，不僅充當鴉片販子的助手和翻譯，而且還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為鴉片貿易辯護。該刊曾多次刊登名為《奏為鴉片》的文章，內容均為引用中國官員對於鴉片貿易意見的奏摺。如引述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為鴉片》一摺的內容，先對鴉片貿易帶來的經濟損失進行計算：“嘉慶年間每歲約來數百箱，近竟多至二萬餘箱，每箱百斤。計算耗銀，總在一千萬兩，其惡弊日增月益，貽害將不忍言，銀有偷漏原易盡矣。”該奏摺分析其中的原因，認為禁煙愈嚴反而流弊愈多，“煙例愈嚴，流弊愈大，請變通辦理，仰祈聖鑒密飭，確查事。雖鴉片惡毒，然其性能提神，止瀉辟瘴，惟吸食愈久，愈害矣。”甚至，奏摺還提到了鴉片能夠提神、止瀉辟瘴的積極作用，並提出了鴉片大量流入中國的對策，即“莫若仍用舊例，准遠客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紋銀，禁其出洋。”^⑥奏摺雖為中國官員所寫，但《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對此全文轉引，實則隱藏著郭士立對於鴉片貿易的支持態度，他借助中國官員的奏摺，間接地傳達出試圖將鴉片貿易合法化的企圖。其後，該刊又引用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嶠的奏摺，對於當時飽受西方新教傳教士批評的鴉片貿易及其危害的解決提出了如此主張：“立志絕鴉片，莫若定例云，汝食鴉片不可進考，不可為士，不可為官，良民咸宜與食鴉片之徒絕交，避之如瘟疫，逃之如賊盜。事情如此，誰肯食鴉片哉？倘行此，不禁用，而自止矣。輾轉行查，試此方法，就諸匪徒化向。”^⑦“其貨罕，價起；豐，價落，此不可易之通商之法。禁其貨，卻民用之價錢高昂，漏稅獲益不勝，或給賄賂私人入關焉，此天下之通理。由是觀之，武力不可絕弊，而民必棄之，若願民棄必教化之。故教化民為絕食鴉片之真法，不然不可也。”^⑧也就是說，在其他傳教士紛紛對於鴉片輸入中國後造成的危害進行揭示時，《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則站在外國商人的角度，為鴉片貿易進行辯護。在後一則奏摺中，編撰者用商品的價值規律現象，勸說中國人放棄武力禁煙的主張，轉而代之以向鴉片貿易收稅。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對於這些奏摺的全文轉載中，我們可以看出編撰者將

自身的身份、立場和觀點進行了遮掩，試圖借助他人的觀點來傳遞本身的思想、情感。

出於宣傳效果的考慮，《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在報導一些人物、事件或現象時，會有意地過濾掉其中的宗教、利益因素，而只保留能夠較為有效地展現西方文明優越性和中外文化友好性的內容。著名的美國醫藥傳教士伯駕，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被描述為醫術精湛、道德高尚的偉大人物，尤其是伯駕所體現出的不分華夷、一視同仁的態度以及分施藥物、接濟貧窮的行為，更是被推到了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編撰者借助漢人感謝伯駕的賦詩，對於伯駕的神妙醫術和無私醫德予以描繪：“我居重樓越兼旬，所聞療治皆奇新。治法迥與中國異，三份藥石七分針。”這是鴉片戰爭前夕的廣州民眾對於西醫的較早接觸。接下來，編撰者具體描寫了不同患者的症狀，有些病症在詩中至今讀來還讓人頗為震動：“癰疽聾瞽雜焉坐，先生周歷如車輪。有女眉生鬥大瘤，血筋縈絡光輪困。自言七歲遭此疾，今又七年半等身。先生撫視曰可治，但須稍稍受苦辛。乃與刀圭日一服，五日再視肩樓門。縛女於塌戒弗懼，霜鏡雪刃爛若銀。且挑且割約炊許，脫然瓜落如逃鶉。過以瓶藥日洗換，旬餘膚合如常人。”另外還有耳疾患者求醫，也在伯駕的高超醫術下得以痊癒：“有兒生無兩耳竅，坦然輪廓皆平湮。先生為之鑿混沌，實以銀管香水歎。塗膏抹藥頻改換，輪廓隱起耳有聞。”更讓人嘖嘖稱奇的是，有的看似病入膏肓的患者，也在伯駕的治療下起死回生，頗富傳奇色彩：“有婦患臑腹如鼓，肢體黃腫死已濱。銀錐三寸入臍下，黑血湧注盈雙盆。須臾肌肉條瘦皺，精神漸復回陽春。”在編者的筆下，精通醫術的伯駕最擅長的還是治療眼疾：“至如治目尤專技，挑剪鉤割無虛辰。治癒奚啻百十計，奇巧神妙難具陳。”難能可貴的是，伯駕不僅醫術高超，而且設身處地為病患著想，醫德高尚：“得效忻然無德色，不治泫然悲前因。嗚呼先生心何苦，噫嘻先生術何神。神術不嫌狠毒手，毒手乃出菩提心。是法平等無貴賤，物我渾一無疎親。”^②

應該承認，報導中對於伯駕面對疑難雜症的冷靜、治療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他在治癒病人不果後對於病因的悲憫，顯示出伯駕作為一名傳教醫生所具有的人道主義精神。但是如果與伯駕的醫藥傳教實際情形相對照，我們發現該刊的報導只保留了對於伯駕醫治中國病人場面的描寫，卻對伯駕藉此機會傳播新教的目的和方式予以回避。從根本上看，“伯駕是合格的醫生，也是按立過的傳教士。對他和美部會而言，醫藥畢竟只是傳播基督教福音的手段或工具，他的目的不僅是通過醫藥治療華人的肉體，更在於拯救他們的靈魂，希望華人能因此而接受基督教信仰，因此伯駕十分在意隨時傳播福音的機會。”^③其實，伯駕在廣州行醫期間的完整的工作場景是，他一邊為華人患者治病施藥，一邊借助治癒病人、得其感激之際加緊宗教傳播活動。“伯駕白天的醫務工作十分繁忙，只能抽出零星時間開展福音傳播工作，為使傳教工作能夠得到有效補充，他做了一個很成功的安排。他安排了當地一個有名的中國皈依者——梁阿發在醫院中充當傳教士，讓他每週一在病人入院以前對他們進行演說。梁阿發向每個病人散發小冊子和手寫的傳單，絕大多數病人都會以‘認真而崇敬’的態度接受小冊子。考慮到當時廣州傳教區域的隔離狀態，以及到那時為止傳教活動尚無甚進展的狀況，伯駕通過建立醫院使他突然可以接觸數以千計滿懷感激之情的中國人，其對傳教工作的巨大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④伯駕借助行醫而推進的宣教工作，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被過濾了，原因或許是刊物的編撰者們不希望華人讀者對於伯駕的醫藥傳教活動引起不必要的警惕，而只希望借此傳達出西方人對於中國人民的友好、慈愛，以及西方文明的先進性。在刊物的報導中只提伯駕的仁心仁術，而忽略其宗教背景和目的，在當時傳教活動受到嚴格限制的情形下，顯然是理性的選擇。伯駕的醫藥傳教，讓廣州及

周邊地區的中國人對近代西方醫藥有了新鮮的、深刻的體驗，並幫助中國人形成了對於西方醫療技術、宗教及文明先進性的局部認知，這也有助於《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的讀者由此形成對於西方近代文明的感知和西人形象的良好印象。而這，恰恰是刊物的重要創辦目標之一。

《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對於南中國海地區歷史文化景觀的描述，雖然不可避免地帶有編撰者的立場、情感和態度，但是它仍然為我們提供了鴉片戰爭前夕這一地區的社會、文化風貌，對於我們瞭解南中國海地區人們的生活、宗教、習俗等有著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人們習慣以鴉片戰爭為限，將此後的階段視為中西文化深入交流的時期，卻忽略了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尤其是南中國海地區的人們，已經較多地參與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事實。他們一方面接觸、瞭解西方的器物文明，一方面出洋貿易、移居海外，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踐行者。《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所勾勒的南中國海地區文化景觀，雖然遮蔽了一些背景和史實，卻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地描繪出中國民眾對於西方文化的接受和認識程度。對於刊物文本進行細緻的解讀，並結合其他史料、著述及當事人的文章，我們才可能看到在中西文化碰撞與交流並存的時期，西方傳教士在中文與英文報紙中表現出的看待中西文化的微妙態度差異，並在此過程中基於不同主體思想、觀念、立場的差異而導致的敘述視野的迥異、對於事物不同側重點的呈現，以及充滿文化隱喻意味的、驚心動魄的精神細節。

①②③④⑥⑦⑨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黃時鑒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43、301、344、344、334、373、384~385、81、331、331、332、46、392、392、392、392、393、3、227、237、248、405頁。

⑤⑧沈偉福：《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9、438頁。

⑩伍宇星編譯：《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33頁。

⑫[美]史景遷：《太平天國》，朱慶葆等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21頁。

⑬Charles Gutzlaff, A Monthly Periodic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187 (Aug. 1833).

⑭當時的許多傳教士都撰寫文章表達對於吸食鴉片的危害的分析，如合信剛、禪治文、雅禪理、衛三畏

等。其中，英國倫敦會傳教醫生合信剛在《中國叢報》上曾發表了一篇文章《一個癮君子的自白，以及吸食鴉片的後果》，通過一個鴉片吸食者的感受分析了吸毒成癮的為害。

⑮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4~235頁。

⑯蘇精：《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1819—1846》，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39頁。

⑰[美]愛德華·V·吉利克：《伯駕與中國的開放》，董少新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4頁。

作者簡介：龍其林，澳門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研究人員。

[責任編輯 陳志雄]